

《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林少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78.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完成《章太炎全集》出版后，推出了“章学研究丛书”。最近，“丛书”有两种新品问世。一本是旅日东京大学教授林少阳撰写的《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另一本是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小林武的《章太炎与明治思潮》（这是国内第一部翻译出版的日文的章太炎研究著作）。

两本著作都是研究章太炎早年（即明治维新后至辛亥革命前夕）思想与学术的力作。两书的论述均具颠覆性与开创性，给了人们耳目一新感觉。两位作者对章太炎的文章、演说、书信……熟烂于胸，又对那个时代的学术了如指掌，对章太炎的早期思想与学术作出了全新论述，给国内“章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风。本文专论林少阳教授的《鼎革以文》，小林武教授的《章太炎与明治思潮》另文再谈。

林少阳教授大著的书名实在有点拗口。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专著，不如说是四篇单独论文的结果。第一篇是“鼎革以文”，抓住了“文”与章太炎的关系，进行深度论述。第二章抓住了“南方”这一概念，深入研究章太炎与清季青年的关系。并通过章太炎与《亚洲和亲会》、印度、无政府主义、黑格尔等的关系，论述章太炎的“民族观”与“国家观”。第三篇，抓住了章太炎的“狂”与“狷”，分析了章太炎的“儒学观”。第四篇，论述章太炎与鲁迅的关系，阐述了“复古”的新文

化运动与“反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人的“章太炎与鲁迅关系”研究不同，他更多研究鲁迅对“章学”的影响。

### 一、关于“鼎革以文”

章太炎是以“文”为手段投入清季革命与文化革命，他通过“文学复古”与“建立宗教”来推动新文化运动，颠覆清政权的思想与文化的统治基础，而这种作用与贡献是被大大忽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无论如何不是同盟会“革命派”一家之力可以完成的，起码还应包括“君主立宪派”及“地方自治派”等力量，以及江浙以“文”为手段的知识分子的贡献。林少阳教授把辛亥革命置于晚清“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去审视，革命并非完全对立，“革命只是改良不果的产物而已”，“无论革命与改良，无不重视传统，无不重新解释并定位中华文明”，这些都说明了“晚清思想文化运动”之影响，革命与改良之殊途同归。而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前后无疑是兼革命派与改良派于一身。1897年3月3日时他还停留在“改良派”，至1899年5月撰写《客帝》时已转向了革命。长期以来，人们视革命即是武装暴动，其实还应该包括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晚清的章太炎，民国初年的鲁迅等的实践为代表的革命，正是以‘文’为手段的革命之典范”。林氏即是把章太炎放在晚清到民初的历史中评论，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接起来思考，找出它们的人脉与思想之共同点即“文”，故他取题为“鼎革以文”。

林氏认为，近代革命有两种，太平天国革命是暴力型的，辛亥革命偏于非暴力的“文”式的革命。“晚清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武昌起义固然有标志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是漫长的清季革命之晚期结果，更为根本的，是持续经年，日益强大的语言的力量”，即“文”的力量，但这一点作用，被后人大大

地忽略了。晚清的文化革命，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而“五四”运动则是这种运动的延伸。

《鼎革以文》从“制度典章”现代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的重构，“文学复古”的新文化运动，“建立宗教”的新文化运动四个方面加以论述。作者指出，“复古”与“宗教”都是应该加引号的，“复古”是借用传统，“宗教”是借用哲学，构建这场革命的伦理。这也是“光复”与“革命”区分之处，该书将“光复”定位于种族革命，“革命”则是拯救“天下”。在“亡国”与“亡天下”的双重危机面前，“章太炎扮演了先知先觉的领导者以及理论家的双重角色”，展示了“文”的巨大力量，促进人们的觉醒，他不仅为救国，更关注如何救天下，这样的角色，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林氏这本著作就是欲把章太炎放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放在全球史中思考，放在西学东渐的学术环境中，放在明治时代影响的环境下，探讨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角度新颖，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但林著将“革命派”与“改良派”混为一谈，或可商榷。

### 二、章太炎的民族观与国家观

林氏从四方面论述了章太炎的“民族观”与“国家观”。

1. 作者首先用大量文字与篇幅阐述了章太炎与“南方”的关系。这“南方”既是南方革命派意思，又是“南方”意识与文化的意识。章太炎毫无疑问是代表了这样一种意识与文化，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南方”构成了对“北方”不同，“南方”也构成了“文化上学术上与‘西方’的差异关系”，“南方”话语其实在有着国族色彩的意义上又是有着一定人工性建构的“南”，使清季的“南方话语”带上浓烈的政治意味。这样的论述是相当独特的。

2. 从1897年至1910年，章太炎一直主张联亚抗西方霸权，主张联合亚洲弱小民族抗衡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从联日本到联印

度，从成立亚洲第一个《亚洲和亲会》到《亚洲古学会》，他主张联合“天山三十六国”，即张謇出西域的三十六国，也是今天所说的“古丝绸之路”的各国，团结反帝。《亚洲和亲会》提出“先于印度、支那二国组成会”，即以“中印、中日”为核心的“亚洲主义”。他的“亚洲主义”核心是“人的自主与亚洲的自主”。对这一段历史，尤其章太炎与印度的关系，以往研究是非常薄弱的，而林著则以翔实史料加以阐述，大大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3. 详细地论述了章太炎与早期中日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这两个思潮是辛亥革命思想最重要的构成之一。书中梳理了章太炎与刘师培、李石曾、张继、吴稚晖、幸德秋水等的相互影响与论战。章太炎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无当”之“玉厄”，即中看不中用，他说“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他所说的民族主义“亦即同情、联合、协助被压迫的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这“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已及之”，是一种宽广的民族主义。这一章节，虽然不如其他章节新意迭出，但论述亦极精细。

4. 章太炎的国家观是以“民之国家”为核心。他否定国家，他认为“国家”会对“个体”与“民”实行压制。他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义理，又致力批判西方学术的谬误。他批判无政府主义奉为金科玉律的“公理”“进化”“唯物”“自然”，他强调这世界上不是单一的直线的发展的，他强调善亦进化、恶也进化，要“令年轻一代努力从这一直线的，被认为不断上升的时间观中解放出来”。章太炎认为这些进化论者及其批判者，其实读不懂真的进化论，因为真的进化论必须是善恶同时并进，他以完善进化论的方式去建构进化论，这实在是章太炎的智慧。

林氏以很多笔墨论述章太炎对进化论与国家的批判，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化进化论观点上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挪用，成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命题，也成为扩张主义者的借

口。“梁启超主张以国家建构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章太炎是以种族主义为其宣传话语，鼓吹种族主义的革命，但更为重要的是，章太炎又是一个反国家的民族主义。”“章太炎断非坊间所想象的唯古是尊的‘国学大师’，他恰恰是以批判传统方式去重构传统，是一个‘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追求的是“公义之‘国学’”。

林氏的论述与研究方法是新颖独特的，显示了作者对二十世纪初前后十年历史的熟悉。他的章太炎研究不仅深刻，言人所未言，而且已不仅仅是对章太炎的研究，而是将读者带到了那个时代，深刻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与人文，将给读者以更多启发。

### 三、清季章太炎与革命儒学

这一章节是很独特也很难读懂的章节。作者抓住了章太炎的“狂”“狷”，来论述章太炎与儒学的复杂关系。

什么是狂狷呢？作者引用了郭绍虞先生的话——“只有狂狷精神可以促民主，争取民主；也只有民主制度才可以培养狂狷精神”。章太炎是以“癫”出名，他的癫狂正是他的狂狷。要推翻旧制度，没有这种精神是断不可成的。旧制度是“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要打破旧德旧礼旧儒学，非要有狂狷精神不可。

章太炎一生被人尊为“大儒”，他对儒有尊重的一面，有批判的一面，他的尊孔与非孔，都是在两个重要语境之中：“一是他与康有为的论争，康有为尊孔，仿效基督教视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为章太炎所斥。另一语境是章太炎素持古文派立场，作为学术史家强调以诸子学为中心的多元学术史观，有别于今文派孔子中心的学术史观。”他的非孔与尊孔，又有不同时段，早年“非孔”，晚年“尊孔”，也都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 四、章太炎与鲁迅之关联及断裂

写到章太炎就不会不论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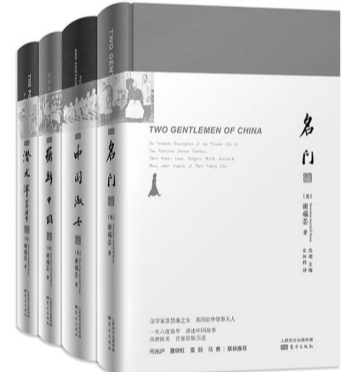
与鲁迅的关系。一般人都是写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这本文集当然也写了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但他是从国家观、政治观、宗教观、写作观等方面去论述，这比一般人论述得更深入全面。鲁迅对鲁迅的深切怀念，并非仅仅是师生之谊，而是表达了鲁迅“拒绝告别革命”的心态，“面对一个并无共和之实却徒有其名的‘民国’，构成了鲁迅对其师‘章太炎’念念不忘的最为重要的背景”，“让‘太炎先生’重新成为现实中革命的思想源泉之一”。鲁迅在纪念章太炎的两篇重要文章中，重新定义“太炎先生”，重新定义“章门”，是要让章太炎作为“革命先驱”流传下去，而不是以一个“纯粹的大儒”流传下去，“鲁迅正是以章太炎战斗精神之正统后人自居”。这些论述是非常精彩的。

但林著与前人论章太炎与鲁迅更大不同是他以很大篇幅“论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这是很新颖的。他认为没有鲁迅研究热，也就没有章太炎研究热，甚至鲁迅对章太炎的论述，成了描写章太炎的固定模式与套路。半个多世纪来，章太炎研究没有跳出鲁迅论章太炎范畴，如“先期革命，后期落伍”；“前半生，后半生”等等。林著可以说突破了这种模式。

“清季革命之后，尤其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后，一个‘章太炎’被年轻的一代分成几块，各取所需；胡适片断吸收章太炎的‘国故’；周作人则与沈兼士等将章太炎作为小学研究之方言音韵‘挪用’于办《歌谣》杂志；鲁迅曾忠实地追随章太炎的新文化运动，然后将之翻转为反章太炎的新文化运动……”章太炎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章太炎’”。林著说得真好。

半个多世纪来，由于各种原因章太炎研究是冷清的。一般人不敢言章太炎，连一般编辑也不敢发这类文章，因为章太炎这座大山太高，爬上去路又太崎岖。而林氏的这部大作，让我们看到了海外章太炎研究的高度，令我们感到惭愧。

（本文作者为章太炎先生嫡孙）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名门》《中国淑女》《新新中国》《潜龙潭》），[英]谢福芸著，沈迦主编，左如科等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158.00元

早在五六年前，看《寻找·苏慧廉》时就注意到“谢福芸”这个名字。她是苏慧廉的长女，中文姓氏“谢”来自于她的先生谢立山——英国驻华领事。《寻找·苏慧廉》中大引用了谢福芸几部作品中的段落，当时这些作品并无中文译，因此这些摘自英文版的段落都由作者沈迦译出，在注释中表明了引用的出处。其中，最有趣的细节是，沈迦从谢福芸这些虚构作品的蛛丝马迹中探索找到苏慧廉与常熟翁氏的关系，然后一路追溯，费劲周折联络到翁氏一脉的后人，已经定居美国的大收藏家翁万戈先生。

沈迦曾在《寻找·苏慧廉》中这样表述：

读过谢福芸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小说，从她个人的经历及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我确信她笔下的

人物及故事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多以化名出现。就像你受邀参加一场化妆舞会，原本认识的人今天有意戴起了面具。于是，探寻她们真实面目的意愿，在我变得更为强烈了。

这是奇妙的探寻。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沈迦凭借谢福芸小说中的段落和照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居然把小说中跟谢福芸关系密切、作为主角反复出现的“富家”和常熟翁氏关联上，并最终得到翁家后人确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谢福芸的小说可以部分当作史料来看的。如今，谢福芸有关中国题材的四部小说中译本一次全部出齐。通过译者流畅的译笔，还原了谢福芸笔下的那个中国世界。而为此套书题写书名的，正是翁万戈先生。如同一个盛开在文字中的花园，经由园丁的执着和辛劳，居然在现实中盛放了书中的玫瑰。而谢福芸大概也不会想到，一百年后，她描述中国的作品真的变成了中文，在这片崭新而古老的大地上传布。而促成其作品中文版出版的人，来自生养她的第二故乡——温州；她在书中用热情笔墨描摹的中国青年“励诚”的儿子题写了中文书名。

我曾经一度疑惑：为什么毕业于剑桥的谢福芸讲述她的中国故事时要用小说的形式？如果用纪实的方式来写作她那些独一无二、无人能企及的中国经历，将会多么

## “异乡人”的乡愁——关于谢福芸和她的中国题材小说

程 鹏

精彩。甚至，遥远时空的读者如我们，也不用再去猜测她书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她所做的这些宝贵记录，都会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作为我们回望中国近代动荡岁月的一个参照。而采用小说的方式写作，会不会有损材料的价值？读完这几本书，我的想法有了改变。

正如阅读《寻找·苏慧廉》时一样，对“苏慧廉”这个人物由陌生到模糊到逐渐清晰，直到丰富饱满；读谢福芸这四部小说，对谢福芸其人也有一个这样认识的过程。在这四部书中，“我”贯穿全书，无处不在。在以往的认知中，对人有了粗线条了解以后，我们总是习惯以贴标签的方式标记人物。对谢福芸来说，在不了解她之前，我们可以为她贴上太多符号化的标签：

生在中国，长在英国；汉学家之女，外交家的夫人；六次旅华，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作品。但是读完这四部小说，我对谢福芸有了一个更感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有趣的人！她从来说把中国当作异乡、异国。她与书中描写的各类人物一块呼吸、生长。她从来不以“他者”的目光来观照她笔下的中国世界，而是自觉地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对于作者，采用小说的形式，似乎更容易抒情达意。就像我们很难用中文对父母说出“我爱你们”，但是用英语写于“非常爱你们”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跳脱了客观的立场，投入自然的虚拟殿堂，尽管建构殿堂的一砖

一瓦都有源可溯，但构建的过程可任由情感的蔓延去指引方向，而不必严格遵循规则和制度。这大概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谢福芸在书中对“励诚”说：

你们中国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们是人，在你们身上，有美德，有恶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她在书中歌颂人性的美好，也鞭挞人间的丑恶。正因为她对中国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她对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都没有被“奇观化”。

这是充分了解所带来的熟练。这种熟练得有文化打底才能自信茁壮。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曾在书中描述他在在中国旅行的感受：“我看不见许多极为有趣的東西。可是我不确定我懂它们。要真正弄懂……就必须懂得那种愉悦，并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些清晰的概念。”（《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谢福芸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显然已经跨越了“观望”和“猎奇”的层面。

谢福芸出生在宁波，七岁之前都跟随父母在温州生活，照顾她的保姆就是一个温州老嫗。在剑桥读完书后，她返回中国，和剑桥同学一块在北京创办了培华中学——林徽因曾是那里的学生。谢福芸是在中国邂逅了她的先生谢立山——一位探险家，还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被称为英国领事界

“对中国内部事务了解最透彻的人”。苏慧廉去世后，谢福芸受牛津大学之邀，编辑整理了父亲的译著《论语英译》，这本书作为“世界经典丛书”之一，长销不衰。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谢福芸，对中国人的感受，显然与来中国走马观花的他者不一样。

在《名门》中，谢福芸讲述了她与两个中国家庭交往的故事。而其中的“富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常熟翁家。苏慧廉在山西办学时曾与在山西做官的翁同龢孙翁斌孙相熟。而《名门》中一再出现的“励诚”，就是翁斌孙的儿子翁之慧。谢福芸曾在翁家短暂借住，因此主要以翁家人物为原型，完成了这本描写中国贵族家庭生活的作品。

而到了《中国淑女》，谢福芸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户，而是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她笔下，有挑夫船工、贩夫走卒，也有挑夫胡适、庚款代表团的英国高级官员。她竭力用笔墨还原她眼里的那片大地。“在这里什么都能找到，贫穷、坚忍、不公、心痛、死亡、激烈的思想辩论、老式的礼节以及偶尔新式的突兀。”“我认真研究你们的生活，中国又反过来教给我许多东西。”

而《新新中国》是谢福芸在二战中献给抗战中的中国的一份礼物。在动荡的时局里，她为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千万普通的中国人的击节鼓劲。“如果我已经亲见中

国在挣扎中辉煌重生，却没能描绘出这幅尚在形成中的画面，我就好像背叛了中国对我的善意，那是不公平的。”

在《潜龙潭》里，她的描写打拐回一段被历史淹没的往事：北平“箴言”女校的创办人和继承者的故事。这段历史鲜有人知。谢福芸和同学在华北创办过女校，深知办学的艰辛，但也更懂得知识对女性的重要性。书中描写了三位坚强的女性，在这些女性的性格特征中，也投注了谢福芸对女性的期许：独立、仁慈、宽厚、善良，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

谢福芸所作的四部中国题材的小说，为她在西方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关注，也相当丰富地超过了她的汉学爸爸苏慧廉。想必苏慧廉心里也很为这个女儿骄傲。他们当时也许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过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她们作为异乡人，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们的文字和照片，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忆，而她们自身，也不自觉融入了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其中暗含着奇妙的缘分。

对于谢福芸来说，中国并不只是一个她生活过的亚洲国家那么简单。她出生在这里，最亲近的人都服务过这个国家。她一生中中国六次。在交通并不顺畅的一百年前，这个数量很惊人。中国，是谢福芸的另一个故乡。这四部作品，浸透了最浓烈的乡愁。



《瘦马行：郎世宁的中国经验》，曹天成著，中华书局2017年12月第一版，98.00元

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了《瘦马行：郎世宁的中国经验》一书。其

作者曹天成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专业博士毕业，《瘦马行》一书就是其博士学位论文补充、深化、延伸而成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2012年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201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提名论文”的荣誉。

郎世宁（1688—1766年）为意大利米兰人，是清朝前期在中国宫廷内供职的一位欧洲画家。由于他的绘画作品别具风格而独树一帜于中国画坛，又由于他的欧洲传教士的身份，以及与中国文人从固有审美标准出发对其绘画并不十分认同，使得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他是被中国美术史边缘化的，甚至

缺席于中国美术史。

第一个对郎世宁有积极正面评价的人大概是康有为（1858—1927年），康有为在其所写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序》（1917）中说：“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国人岂无英雄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吾斯望之。”此后东瀛的日本学者石田幹支助（1891—1974年）撰写有《郎世宁传略考》一文，经中国学者贺昌群（1903—1973年）翻译成中文，刊登于1933年的《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3、4号上。早期的故宫博物

院（包括古物陈列所）开始出版郎世宁的作品集，由此推动了对郎世宁生平及其绘画艺术的研究。中经若干年的被遗忘，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到本世纪初，欧洲传教士画家受到了更多重视，相关研究也多了起来。曹天成的《瘦马行》就是其中的优秀成果。

作者在《瘦马行》序言中大致回顾和梳理了中国及欧洲学者研究郎世宁及其艺术的过程。全书共分五章：一、耶稣会士；二、画家人；三、“他者”；四、瘦马；五、隐喻。该书从介绍明清时期中西文化接触的宏观大背景开

始，然后进入到作为画家的郎世宁在清朝宫廷内的活动，再具体到郎世宁的作品，进而探讨郎世宁的代表作《百骏图》卷中所含有的中国文化的因子。层层推进，层层剖析，作了精彩解读，从文化思想层面深化了对郎世宁作品的认识，而非仅仅停留于对郎世宁绘画风格的分析。

在扎实的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比如对郎世宁《百骏图》卷及其他郎世宁马作品中的“瘦马”形象，作了新颖的解释，试图揭示这位欧洲传教士画家的内心世界。这是过去的研究很少涉及的。作者既叙述了郎世

宁在清朝宫廷内取得成功的一面，也叙述了郎世宁对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的一面。作者提出，郎世宁之所以在作品中多次描绘瘦马形象，是与他不得意的境遇有密切关系的，是他传教事业受挫以及自己在皇室内地位失落、内心苦闷情绪的自然流露。这一见解新颖独特，值得关注。

如此类美术史的图书，如果仅仅只有文字的叙述，就会显得单调甚至枯燥，而《瘦马行》中穿插了相当丰富的彩色图像资料。图文并茂是读者最为喜欢的阅读方式，相信该书对一般读者都会很有吸引力。